

学有所得

■屈泽清

合上《平凡的世界》那本厚重的书，指尖上仿佛还残留着黄土高原的尘土气息，耳畔仍回响着双水村的鸡鸣犬吠与田埂上的脚步声。

第一次与这本书相遇，是在1997年，那时我刚刚20岁，在武陵源最为偏远的一所村小当老师。校舍是几间一层的平房，黑板斑驳，课桌椅参差不齐，却装着一群孩子的求学梦。

书不是我的，是找同村的黎兴泉借的。这个比我大三岁的男人，总让我想起书中的孙少平，浑身带着一股被苦难磨出来的韧劲儿。

黎兴泉是本村人，高中毕业后在中心学校代过一阵课，后来因为家里负担太重，不得不放下课本扛起生活。他的日子过得难，老娘眼睛不好，干不了农活。一间旧木屋被一场意外的大火烧得精光，只能暂住在亲戚家。还有个智力有问题的哥哥，需要人时时照顾。

可即便被这么重的担子压着，黎兴泉从没露过半点颓废。我每天八点半上课前，他已经从天子山景区返回，来到学校小坐一会儿。

于是我知道，他每天凌晨4点挑着满满一担水果，主要是自家地里产的桔子、梨子、李子和一些土特产，用粗麻绳捆结实，从家里出发。那时，从村里到天子山景区，要翻山越岭，走二十多里山路，来回三四个小时。他全靠一双脚丈量，坚持了好几年时间。

有一回，我同他聊天时无意间瞥见竹筐缝隙里露着书的一角，封面已经磨得发白，正是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他见我盯着书，笑着说：“路上歇脚的时候翻几页，看看孙少平，就觉得自己这点苦不算什么。”那天我跟他借了书，他特意叮嘱：“你慢慢看，我白天卖货，晚上回来也能看几页。”

往后的日子里，我总在课余捧着这本书读。

土坯房的煤油灯下，孙少平啃着黑面馍读书的样子，总与黎兴泉挑着担子在山路跋涉的身影重叠。一个在书中与苦难对抗，一个在现实里为生活奔波，却都没被命运压垮。

这本书我前后看了不下五遍，书页被翻得卷了边。有些段落还被黎兴泉画上了横线，想来是他在山间歇脚时，与孙少平产生的共鸣。

路遥用近百万字的篇幅，将1975年至1985年间中国农村的变迁与普通人的命运娓娓道来。没有奇幻的剧情，没有传奇的英雄，孙少平的人生，本就是一部在苦难中追逐光亮的史诗。

孙少平出身于双水村最贫困的家庭，高中时每天只能啃着难以下咽的黑面馍，躲在角落看着同学们吃白面馒头。毕业后回到农村当教师，却因政策变动失去工作，只能跟着父亲去揽工，在砖窑里扛着沉重的水泥袋，皮肤被晒得脱皮，手上布满裂口。

可即便身处泥泞，孙少平从未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——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在揽工的工棚里借别人的书摘抄笔记，甚至在成为煤矿工人后，依然坚持在下班后读书、写日记。

书里的世界，成了孙少平对抗苦难的武器，也让他在贫瘠的生活里长出了精神的翅膀。

最让我震撼的，是孙少平面对命运暴击时的坚韧。当他深爱的田晓霞在抗洪救灾中牺牲，这个曾在苦难中从未低头的青年，第一次被彻底击垮。书中描写他独自坐在矿区的老槐树下，眼神空洞，泪水无声地淌满脸颊，连平日里最爱的书都无法翻开。

可孙少平没有沉溺在悲痛里，而是带着晓霞的照片，重新回到了煤矿井下。在黑暗的巷道里，他挥舞着铁锹，将思念与痛苦化作前行的力量。在工友遇到危险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帮忙，用行动践行着晓霞曾说过的要做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。

这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恰是黎兴泉身上最动人的特质。后来，黎兴泉凭着去过多次天子山的经验，干起了导游。嘴甜、细心，又熟悉山路和风水人情，渐渐有了稳定收入。再后来，他成了家，有了两个孩子，把老娘接到身边照顾，连智力有问题的哥哥也从没落下。

前些年旧地重游，见他盖起了别墅，红瓦白墙，在村里格外显眼。他用自己的双手，把书中的希望活成现实里的好日子。

那本《平凡的世界》，黎兴泉后来送给了我。每次重读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我总会想起他，也会想起路遥先生耗尽心血的创作故事。

为了写好这部普通人的史诗，路遥从1975年就开始筹备，他骑着自行车走遍陕北的乡村、矿区，走访了数百位农民、工人、教师，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都装进笔记本。为了还原1975年至1985年的时代细节，他翻阅了十年间的《人民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，甚至连不同年份的粮票样式、物价波动都一一核实。

写作期间，路遥搬进了一个简陋的煤矿招待所，房间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他每天凌晨三点起床，写到中午，下午要读书，要去矿区和人聊天，晚上再修改白天的稿子。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经常胃疼得直冒冷汗，却依然不肯停下笔。

有一次，路遥因为过度劳累晕倒在书桌前，送到医院后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让助手把稿子拿过来。他曾在日记里写道：我要把普通人的命运写出来，他们不完美，却在努力活着，这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事。

1988年5月25日，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三部定稿，路遥走出房间，在院子里放声大哭——这部耗费他13年心血，近百万字的作品，终于完成。可此时的他，身体已经垮了，肝硬化、糖尿病接踵而至，1992年，年仅42岁的路遥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曾用心书写的“平凡世界”。

他用生命写就的故事，却像一粒种子，在无数普通人心里发了芽，让我们在面对苦难时，总能想起孙少平的坚韧。

如今，那本磨破封面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还在我的书架上，扉页上有黎兴泉当年写的一句话：“日子再难，也得往前奔。”路遥也在书里说：“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。”

以前我总觉得伟大离自己很遥远，认为只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才算有价值。可读完这本书，遇见像黎兴泉这样的人，才明白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，但平凡不代表平庸。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面照亮人生的镜子。它让我看到了苦难的价值。苦难不是用来打倒我们的，而是用来让我们学会坚韧。它也让我懂得了平凡的意义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真实的幸福，平凡的努力里蕴藏着最动人的力量。

徐光耀：百年人生一路“凿真”

■王文华 苏凯洋

《小兵张嘎》作者徐光耀是抗战老兵，这位百岁老人仍坚持书写，他常写的两个字是“凿真”。他说：“我觉得办事就是在石头里面刨、凿、肯凿、较真，我这一生占了个便宜。”

今年8月20日，徐光耀文学创作80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。徐光耀之子徐丹谈到，父亲最显著的文学成就无疑是在抗战文学领域。“在文学路上，父亲一直牢记作家的责任和担当，坚持为人民创作。”“凿真”一直是我敬佩父亲的一点，也是父亲传承给我以及我们全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”

1938年7月，13岁的徐光耀参加八路军。他说：“抗战爆发后，我的家乡河北雄县一带各种势力并起，之所以选择八路军，是因为他们纪律严明、战斗力强。”参军前徐光耀只读过四年初中，谈及能够成为著名作家的原因，他认为：“第一是党的培养，提高了我的政治水平，使我加强了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，使我认识

了我们存在的前途和意义。第二是我办事比较认真，比较负责任。我喜欢文学，我就在文学上‘凿真’。”

百年人生，徐光耀一路“凿真”，他是写故事的人，也是有故事的人。

他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最残酷、最艰难、最危险的是在抗日战争。”徐光耀说，最危险时，他曾与死亡擦肩而过。一个伏击战中，他在道沟里想抬头看看，被敌狙击手瞄准，下意识歪头救了他一命。“我觉得眼前一亮，右肩膀一动，子弹把我的棉袄打了个窟窿，棉花都‘蹦’出来了。”

抗战时期，徐光耀跟随部队坚守冀中，亲历大小战斗上百起。每到一处，他总要想办法找一些书来读，慢慢地可以写一些日记、家书乃至战地通讯了。1944年10月，徐光耀给家里写信：“爹！您耐心的等着吧！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……明年就要反攻日本，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！”

今年，徐光耀将这封珍藏了80多年的信，捐献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。他说：“这封信，纸已发黄，字迹模糊，内容简略，但它既饱含了我作为儿子的孝道亲情，更有我作为一位战士保家卫国的决心。”

他是战士，笔耕不辍的战士。徐光耀走进文学“战场”并非偶然，一次暗夜行军途中，有位战友和他约定：不管哪个先死，后死的一定要为他写篇悼文，以寄托友谊和哀思。可真到了战争结束时，徐光耀一想，“需要写文悼念以光大其事的人，得有多少啊。真是成千带万，指不胜屈。”

“后来，我走上了文学道路，写抗战题材，我是把它当作一种使命和责任的。”徐光耀说，“素养不高，笔力不够，能做一分是一分，但是义不容辞必须要做。”

怎样有益于写作，徐光耀就怎样做。丁玲指导他要深入生活、要艰苦。“一时写不出东西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”。1953年7月，徐光耀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，回到故乡雄县鲁岗任区副书记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。“我一定要经

历这个农村发展的重要阶段。我军战士绝大部分是农民，我要是不懂农村和农民，我也不会懂真正的战士。”徐光耀说。

徐光耀在文学路上孜孜以求，持续“凿真”。

1941年开始写日记，2015年十卷本《徐光耀日记》出版发行；1961年小说《小兵张嘎》发表，1963年同名电影公映；1999年，写成纪实文学作品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，后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；2024年，荣获“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”……

徐光耀说，他很怀念战争年代在部队时的组织生活，一个礼拜开一次生活会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“我想，就是这种自我革命、不断‘凿真’的精神，让我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一位作家。”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有人问徐光耀想对牺牲的战友说什么。他说：“你们是最纯粹的人，最高尚的人，最勇敢的人。你们的热血没有白流，你们热血的颜色，永远飘扬在我们的国旗上。”（据新华社）

新书推荐

《张家界村志》为千年之名立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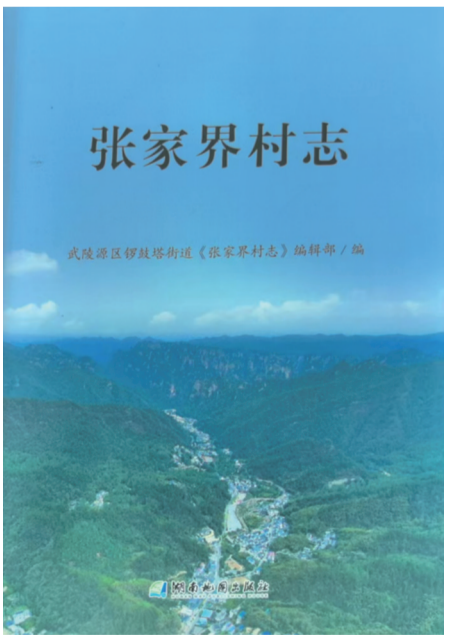
■戴楚洲

今年8月，湖南地图出版社推出《张家界村志》，用十八万字、四十幅彩图，把武陵源区锣鼓塔街道张家界社区的乡土、人情、古道、稻浪一并收进书页，摆上书架。

2015年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提出“一村一志”。张家界市地方志编纂室立即行动，锣鼓塔街道张家界社区居委会搭建编辑部，五位本地老人、三名返乡大学生、两位退休教师组成写作专班。五年时间，他们走村串户，拜访乡贤，开座谈会，查档案，改稿子，反复打磨。全书八章五附录，配图四十幅，共十八万余字，记下社区的山水、历史、姓氏、组织、经济、社会、名胜、文化、民俗和人物，梳理千百年发展脉络。

《张家界村志》入志资料准确，是部体例完备、观点正确、内容全面、资料丰富、文风朴实的成熟志稿、精品图书。篇目设置符合地方志书要求，框架结构科学合理，层次分明，符合地方志书编纂规范和出版标准。该书地方特色鲜明，厘清了张家界村历史发展脉络，提出景区地名张家界名称的由来、龙凤古驿路和红二军团长征路等新观点，具有较大的存史价值、学术价值、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。该书确认，明代弘治年间，永定卫大庸所指挥张万聪得到龙凤庵一带封地以后，便带领族人世代定居于此。明代崇祯年间，其张万聪的后裔张再弘设衙署于索溪界而更名为“张家界”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张家界高级社把荒山林地赠予大庸县人民政府创办国营张家界林场，后来发展成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，进而以张家界村冠以地级市名，将张家界市美名传于世界。

社区编纂这部志书，旨在为各界人士提供可靠史料，弘扬地方文化，规划乡村未来，确立张家界旅游发源地地位，助力武陵源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，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。



张家界村志

武陵源锣鼓塔街道《张家界村志》编辑部/编

读书有味

■柯云 湘斌

这是阿芳向我讲的一个动人故事。它从60年代末期开始，发生在龙潭河的上游岩泉寨。

那时叫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。岩泉寨是大山中的一个自然村，过去通船，船废后，长期由于环境恶劣，交通不便，贫穷、闭塞、落后三顶帽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。一天，公社领导忽然来到这里对我们队长说，不久将有一批常德知青青年到这里插队落户，要做好欢迎他们的准备工作。果然第三天，由县知青办负责人送来6名学生般的男孩，集体住在我家门前一栋队屋内，美其名曰“知青居住专户”。

那时我刚从中学毕业回家务农，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回乡知青。因客观条件和他们拉近距离。常德娃子开始进入“农村广阔天地”，一切都感到新鲜，也为封闭的山村带来了生机。可是时间一长，他们便耐不住这种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生活了，那颗不安份的心浮躁起来，难免就作出一些出格的事儿，自然遭到社员们的反感，然而里面有一个人称秀才的娃子，他却与众不同，不仅人长得好，而且很守规矩，他除了白天干活以外，晚上就向农户取经式地向家长问短，用小本本记录下来。他说话客气，举止文明，真像个秀才。社员们都很喜欢他。情窦初开的我，慢慢向他走近了。

中秋节的这天夜里，同他进来的5位知青，相约到附近几里远的一个长沙娃子知青点玩去了。独他一人守屋。他将我叫去，说有事相商。当我一坐下，他就开门见山地问，你喜不喜欢吃月饼？我不由心中一惊：“什么月饼？”接着说：“我们这里哪有月饼？只怕从天上掉下来吧。”他告诉我，前天，他的家里为他捎来了8个月饼，他吃了两个，现在还剩6个。他边说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递在我的手上。我毕竟还留有孩子的稚气，经不住月饼的诱惑，接过手张口就吃。他大概看出我那馋猫样子，笑了，笑出一口整齐的白牙。说实话，我还想吃第二个。这时他又发话了：“这剩下的几个月饼，我也给你，不过有个小小的交换条件……”，他的话还未讲完，我感到脸似火燎，心中像

书和月饼的故事

窜进一只兔子。他忙说，别误会，我毫无歹意，是想请你帮找一本书读读。他笑着说，他在小孩时就喜欢看，读中文学时买了不少古今中外名著，可惜在文革初期，这些书都被抄走了。我好一会才缓过神来：“书倒是有一本，只可惜它是毒草，我的爷爷为保藏它，差点让红卫兵打死。爷爷在临终前才交给我，要我将其保存下去。我点头答应爷爷，一定做到，人在书在，人没书在。爷爷才放心西去。”

“是本什么书？如此珍贵？”他按捺不住渴求之心，迫不及待地要一睹为快。“红楼梦。”我神秘兮兮地告诉他：“是老版，上海商务书局印制的，挺漂亮”。

他说：“那的确是好书。它不是毒草，是金子，迟早要闪光的。”他为要尽快看到书，迅速将5个月饼交给我，要我当晚把书给他。

夜已静，月如钩。我像幽灵般溜进屋内，生怕父母知道，小心翼翼，作贼似地把书取出来。又迅速来到他的面前，双手把书呈上。他接在手中，爱不释手。问我能借多久？我一语双关地说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它，就给你吧！我只是再三叮嘱他，一定要保密。他说我给月饼的事也不要说出去。

从他的谈话中，我发现他是个有志向的文学青年，将来准会当一个像样的作家。

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书的密算是没泄密，而月饼却惹起了一场风波。

原来，我将月饼给父母备一份让他们吃后，并讲了月饼的来源。细心的母亲忽生恍然大悟之感，她见我和他相处日子较多，以为我们悄悄好上了，她心中反而高兴，认为女儿找了个洋女婿。大喜过望，嘴不留神，在一个亲戚面前说漏了马脚。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连同来的几位常德娃也相信了。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当面取笑，真是山雨欲来。对此，我不仅不在乎，还暗暗窃喜，心想，只要大家公认了，我俩的关系就确定了。止不住内心喜悦，主动问他打算怎么办？他说：“心中无愧，不怕打雷。”没等我答话，他又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俩就是兄妹关系，我正好缺个妹妹，按你们这里的土家风俗，你叫我阿哥，我叫你阿妹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烧

着脸说：“这个称呼不合适吧，我们这里的情哥情妹也这样称呼的呀！”他若无其事地安慰我：“管人家怎么看，树正不怕影子斜。”

也许他的这个办法起了作用，也许世俗的目光已习以为常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便风平浪静了。

从此，他每天除了干活以外，就是坐下来写个不停，在深夜里他就看书，似乎成了规律。

一年之后，赵家堰水库动工了，全县青壮年民工都上了，约3万人，我和队上的知青们也去了。他去后不几天，就调到指挥搞宣传，编节目，办广播，我经常读到他的油印作品和听到他的声音。他不管工作如何忙，只要遇上月饼季节，他就买了几斤给我送来。三年后，水库竣工了。同他来的5位知青都先后“飞”回去了，而他都留了下来，区里要他担任文化站站长。他虽已不住在我们队了，但他每年8月给我买月饼的事，总是想那周时，未曾忘记过一次。

随着时间蔓延，我的婚姻大事也就这样搁了下来，是等他吧？可他从未提过这件事。不是等他吗？多少人向我求婚，我和家人总是婉言谢绝了。

70年代末，他被招工到长沙一家文艺团体，说作编剧。临走前夕正是8月，他来我家，带了好几斤月饼，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奇怪的是他却只字未提婚事。我不知他葫芦装的是什么药，也不好主动问他。一个月后，他给我寄过一封信，信中说了插队的收获和兄妹间的友谊，也未提婚事，最后特地说，只要月饼上市，我一定给你捎来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捧着信伏案哭了一饱。我在信中狠狠地写了一行字：“傻瓜，我要的不是月饼！”从此，他不再来信了。已为人妻人母的我，对他仍是一片痴情，密切关注他的消息，并意外在电视上发现他和妻子的场面，使我幡然大悟。我从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。发现他不仅著作颇丰，电视连续剧连续出，还以著名剧作家而进入省文艺团体班子。我在心中自豪地说，算我有限力，他果真不是一般木料，而是一块作家大材；可我也不看走了眼，未能看透他的内心，他爱的是那本书，那份送书的情，不是我这个人。我恨死月饼，给我惹下的缘和怨。

在甘肃省定西市漳县盐川学校，孩子们捧读的不仅是文字，更是由AI课程点亮、通往未来的科技星光。

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